

百年初心照征程

——纪念中共宁夏特别支部建立100年

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

1926年9月,中共宁夏特别支部在宁夏城鼓楼(今银川鼓楼)正式建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宁夏建立的第一个党组织。自此,马克思主义革命火种播撒宁夏大地,宁夏各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正式汇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革命洪流。作为大革命时期党经略西北、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开展建党探索的早期实践,中共宁夏特别支部虽仅存续一年有余,却完成了宁夏革命史上具有奠基意义的思想启蒙、组织开篇与力量积蓄。站在百年节点回望,梳理其诞生脉络、总结其实践经验、挖掘其精神特质,既是对革命先辈的深切致敬,更为新时代宁夏传承红色基因、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滋养与精神动力。

中共宁夏特别支部的创立与发展历程

20世纪20年代中期,大革命浪潮席卷全国。为巩固北伐战争后方、拓展中国共产党在西北的工作版图,党着力推进西北革命工作,派遣党员骨干随国民军联军西进,推动马克思主义向西北内陆传播。

宁夏长期处于军阀割据统治之下,苛捐杂税繁重、土地兼并加剧,底层民众深受封建地租、军阀盘剥与高利贷多重压迫,社会矛盾尖锐,时任国民军联军第二师刘郁芬部政治处负责人的共产党员钱峭泉,赴陕北联络中共党组织后,带领李临铭、王兆卿、陶振亚、贺维新、马思然、牛化东等党员及进步青年30余人途经宁夏,拟赴兰州军事政治学校学习。应随军中共党组织要求,钱峭泉将李临铭、贺维新、陶振亚、马思然等骨干留在宁夏城开展地方工作。留守党员随即与国民军联军宣传队中的共产党员马云堃等人会合,共同组建了宁夏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宁夏特别支部,李临铭任书记,马云堃负责日常工作,贾一中负责共青团工作。

为适应国共合作的斗争环境,同步成立国民党宁夏县党部,由李临铭兼任常务主任,两处机构同驻宁夏城鼓楼办公,以“国民党的牌子、共产党的内容”方式,实行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的斗争策略。

中共宁夏特别支部成立初期,由国民军联军中的党组织领导,主要以国民党县党部名义开展活动。1926年11月,中共陕北党组织又从榆林、绥德等地选派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参加国民军联军工作。鼎盛时期,中共宁夏特别支部党员发展到18人,共青团员发展到三四十人;本地党团员多来自甘肃省立第五中学、甘肃省立第八师范(并称“五中、八师”)的进步师生,白虹剑、叶松龄、征克非及张子华(王绪祥)、孙殿才、王子端、李天才等一批青年骨干在此期间走上革命道路,成为宁夏本土革命力量的

源头。1927年3月后,中共宁夏特别支部先后直属中共陕甘区委、中共陕西省委领导。

1927年4月和7月,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大肆逮捕、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全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白色恐怖迅速蔓延至宁夏。面对骤变的局势,中共宁夏特别支部沉着应对,有序组织李临铭、陶振亚、贺维新等地党员分批转移撤回陕北,留下贾一中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坚持开展工作。同年9月,国民党当局在宁夏全面推行“清党”,进步报纸《中山日报》被查封,贾一中、马云堃等外地中共党员被驱逐出宁夏,本地党员也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各群众团体被迫解散。至此,中共宁夏特别支部被迫停止活动,宁夏大革命运动转入低潮。

中共宁夏特别支部的革命实践与历史功绩

传播革命思想,开展反帝爱国宣传。中共宁夏特别支部联合国民军联军宣传队,建立固定阵地与流动宣传相结合的传播体系。依托鼓楼办公场所设设阅览室,陈列《新青年》《向导》《共产主义ABC》等进步书刊,面向进步师生和知识群体系统阐释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紧扣宁夏城乡社会特点,利用集市、庙会等群众聚集场合,组织“五中、八师”学生张贴标语、街头演讲、绘制漫画、排演活报剧,用通俗语言揭露军阀统治的黑暗,宣传革命主张。1927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中共宁夏特别支部在宁夏城组织大规模群众游行,各界民众踊跃参与,是宁夏较早由党组织领导的群众性革命集会。同年5月30日,支部组织举行“五卅”国耻纪念集会,控诉帝国主义枪杀顾正红等人的暴行,号召群众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有力激发了广大群众的反帝爱国热情。

推动社会革新,伸张民众正义。在开展思想启蒙的同时,中共宁夏特别支部以青年学生为先锋,在宁夏城乡推动一系列社会革新运动:发动群众反对封建迷信、提倡男女平等、推动妇女放足、倡导公共卫生,引导民众破除落后习俗;支持群众控告贪官污吏、打击土豪劣绅,反对封建压迫、伸张社会正义。配合国民军联军依法枪毙3名经群众告发、犯有贪污勒索罪的兵站站长,切实回应民众诉求,让革命理念从口号走进了百姓

的现实生活。

建立群众团体,凝聚各阶层进步力量。中共宁夏特别支部分层分类筹建工会、农会、商会、学生联合会等群众团体,将党的工作触角延伸至城乡各个阶层,搭建起党联系基层群众的组织纽带。党员深入皮毛、纺织、五金等手工业作坊,发动工人争取合法权益;走进城郊乡村,动员农民反抗苛捐杂税;团结各族群众,最大限度凝聚革命力量,为党在民族地区开展群众工作积累了早期经验。

培育革命骨干,积蓄长远发展力量。中共宁夏特别支部高度重视人才培养,把学校作为青年工作的主阵地,通过谈心引导、实践锻炼等方式,对进步师生开展思想教育,稳步发展党团员队伍。同时有计划地选送袁金璋、雷启霖、李雨村、张子宽、刘廷栋等一批优秀青年赴西安中山学院深造,系统学习革命理论与工作方法。这批青年骨干后续大多成长为宁夏进步力量的核心人物,在抗日救亡、宁夏解放及地方建设中持续发挥作用,实现了革命火种的代际传递。

纵观中共宁夏特别支部的存续历程,其历史贡献具有开创性意义:实现了宁夏党的组织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首次在宁夏系统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唤醒了民众的革命意识,培育了第一批本土革命骨干,为此后红军西征、抗日救亡运动兴起及宁夏全境解放积蓄了力量,是宁夏革命史当之无愧的重要原点。

赓续红色血脉 奋进时代新程

深刻总结中共宁夏特别支部的宝贵精神特质。中共宁夏特别支部的革命实践,积淀形成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宁夏红色基因的重要源头。

一是坚守信仰、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早期支部党员远离组织,身处敌后,在基础薄弱、环境险恶的边远地区独立开展工作,始终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不计个人得失、不惧生死考验,以对党的绝对忠诚完成了建党奠基的使命,彰显了共产党人纯粹的政治本色。

二是敢闯敢试、开拓进取的奋斗精神。宁夏此前既无党组织基础,也无成熟工作经验可循,中共宁夏特别支部的党员在一片空白中探索建党模式、创新工作方法,从思想传播到组织建设、从群众动员到统战工作全面破局,以实干担当开辟了西北革命的新局面。

三是扎根群众、为民服务的宗

旨意识。中共宁夏特别支部的全部工作始终围绕解除民众苦难、争取群众权益展开,从打击贪官劣绅到推动社会革新,从改善劳工待遇到培育青年人才,始终与底层群众站在一起,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为人民谋解放的初心。

以宝贵精神为滋养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新篇章。跨越百年,宁夏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传承中共宁夏特别支部的宝贵精神血脉,就是要把革命年代淬炼的信仰力量、奋斗精神,全面融入新时代宁夏改革发展具体实践,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感恩奋进、真抓实干,不断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

铸牢政治忠诚,把稳前进方向。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各项事业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

勇担使命任务,推动高质量发展。紧紧围绕加快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时代使命,立足生态保护、产业升级、乡村振兴、改革开放等重点领域勇于破局、攻坚破难,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厚植民生情怀,增进群众福祉。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层治理体系,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紧扣主线抓手,深化民族团结。牢牢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巩固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生动局面,汇聚起全区上下同心同德、干事创业的磅礴合力。

百年初心照征程,砥砺奋进正当时。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深入传承弘扬中共宁夏特别支部孕育的革命精神,坚持以史为鉴、实干为要,勠力同心、笃行不怠,就一定能够建设好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环境优美、人民富裕的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的崭新篇章。(执笔:刘 志)

宁夏英烈故事

莫如信:以农兴乡守初心 扎根塞上铸丰碑



莫如信。

莫如信,宁夏平罗人,1898年出生于前进乡前进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5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平罗县前进乡农业生产互助组组长、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人民公社副社长、中共平罗县委合作部副部长等职。20世纪50年代初,莫如信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在宁夏北部地区率先成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带领所在村的部分农民走上了农业生产合作化的道路。他们创办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同全国早期创办的一些农业生产合作社一样,在当时代表了中国农民前进的方向。

1949年9月宁夏解放,莫如信被马鸿逵部队抓去当兵的儿子回到了家,他打心眼里感谢共产党。1951年,抗美援朝捐献活动一开始,他积极响应,带头捐献,并积极协助干部走村串户,发动群众捐款捐物。在他的带动下,全村捐献人民币96万元(旧币),元宝及碎银242两、金镯一对(重1.9两)、香油50斤、乳牛一头,共折合人民币680万元(旧币)。

1951年春,为了保证春耕顺利进行,党和政府号召调剂余缺,借贷自由,实行精耕细作,发展生产。莫如信积极协助乡干部边宣传党的政策边发动群众,调剂出麦种48石(每石150斤),使乡里缺籽种的群众都及时播上了种。在农业生产中,他按照各种作物的生长特点,精耕细作,合理施肥,适时中耕、放水,取得了高产。为此,他受到了县、省政府和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嘉奖。

1951年夏,党和政府号召精选碧玉麦良种。当时,群众一来没有田间选种的习惯,二来怕踩坏将要成熟的麦子,迟迟不动,彼此观望。为了带动乡亲们,莫如信首先动员全家人下地选种,自己协同乡干部跑遍全乡5个村,冲破种种阻力,说服、动员群众,以村为单位,组织起6个选种变工队,共计378人,分成18个小组,用了12天时间,比原计划提前3天完成了全乡2003亩土地的选种任务。夏收后政府收购碧玉麦良种,他协助乡推广站的干部提出“保收保送”的口号,挨门逐户动员群众订立良种收送合同,保质保量地顺利完成任务。通过夏季选种,显示了“组织起来”的优越性,他趁

牛毛井村,东距盐池县城约24公里,现为王乐井乡牛记圈村所辖自然村。陕甘宁边区时期,这里曾是国民党针对边区进行特务活动的哨点之一。

1937年冬,马鸿逵部两个骑兵团分别进驻盐池二区兴武营、宝塔,1938年春,又退至清水营(今属灵武市东山镇)。1939年3月,马鸿逵部骑兵第四团五连以“借防”名义进驻宝塔村,并在当地编制保甲、抓人派款,叫嚣“收复失地”,试图侵蚀陕甘宁边区的控制范围。同时,借口“设立防空监视哨”,深入牛毛井设立哨站,此举实为进行特务活动。

1940年4月,为了维护边境安全,反击国民党的侵扰破坏,盐池县政府下令驱逐牛毛井哨站,拔掉扎在牛毛井的电杆,国民党将哨站移至宝塔(今属高沙窝镇)。

1946年11月,马鸿逵为了策应胡宗南从南线进攻陕甘宁边区,调骑兵第十旅十九团侵占兴武营、天池子,并派小股人马侵袭牛毛井、袁记梁等地。马鸿宾三十五旅一〇三、一〇四团也盘踞在石家圈、长流墩等地。马鸿逵部侵占盐池后,又在牛毛井设立了电话站,进行特务活动,对边区安全构成威胁。

1947年,国民党发起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马鸿逵乘机配合



(资料图片)

胡宗南侵犯三边。3月24日,盐池县城陷入敌手,红色政权被迫转移到南部山区打游击,国民党盐池县政府重返县城。

1947年7月7日,西北野战军协同地方武装收复盐池县城,国民党盐池县政府退往惠安堡。8月初,西北野战军主力奉命转至外线作战,马鸿逵部借机再度发起进攻,8月12日盐池县城第二次失陷,盐池游击队随即转入南部山区坚持游击。

1947年10月,盐池游击队获悉敌军主力支援榆林,后方守备空虚,随即挑选陈万、田枝叶、王福、刘正、马俊、张富宝6名战士组成突击小分队,计划潜入县城北部土沟村,抓捕国民党盐池清乡团大队长张某,铲除地方反动祸害。

黄昏时分,6名战士从张平庄(今大水坑镇二道沟行政村)出发,连夜向敌占区行进。天快亮时抵达刘窑头村(今青山乡境内),隐藏在村庄附近沙漠之中。待到夜幕降临,队伍继续向前机动,半夜抵达叶家豁子村一户陈姓群众家中。经打探得知,牛毛井驻守着马鸿逵部一个排的骑兵,专门负责守护通信线路。敌情发生变化,小分队当即决定,连夜突袭牛毛井电话站。

趁着夜色笼罩,6名战士悄悄摸进牛毛井村内,借着微弱天光望见电话站周边电线杆,确认目标位置。队员兵分两路,向敌人驻地逼近。看到电话站门口两名哨兵,游击队员刘正率先开枪,没有命中目标。一名哨兵迅速逃回屋

内,另一名躲进马棚。战士们立刻集中火力封锁房门,屋内敌人摸不清我方实际兵力,不敢冲出屋外,但拒不投降,妄图固守待援。牛毛井向西三四十里的兴武营驻扎马鸿逵部骑兵团,向东四五十里的盐池县城也驻有国民党部队,一旦拖延极易遭到敌军合围,必须速战速决。

队员一边射击,一边向屋内敌人喊话劝降,敌人依旧负隅顽抗。短暂沉寂过后,3名敌兵突然从屋内冲出来趁夜逃窜,游击队员开枪将其中一人击伤,另外两人趁夜色逃脱。屋内残余敌人继续向外射击,双方形成对峙。

眼见天色即将放亮,小分队商议后决定不再恋战,务必在黎明前解决战斗。6人分工协作,3名战士持续射击进行火力掩护,另外3名战士冲入马棚,牵出6匹战马。一人一骑,趁着夜色安全撤回张平庄根据地。

整场战斗历时约半小时,缴获战马6匹、步枪3支、皮袄3件以及部分弹药。这次战斗虽然规模不大,却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极大提振游击队员士气,也鼓舞了敌占区群众同反动派斗争的勇气。战后,三边军分区专门通报表彰参战人员,给6名战士每人记大功一次。(据盐池县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陕甘宁边区的植树造林工作



建立农林科学实验性质的光华农场,培养林业技术。图为光华农场的技术人员讲苗圃技术。

延安时期,植树造林、林木保护也是当年陕甘宁边区的“一个要政”,是一项有组织、一以贯之的运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生态文明意识。

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设置的林业管理机构为建设厅,分区和县政府设农林牧科,区、乡政府设林业委员,负责本地区森林保护和植树造林等工作。1940年8月26日,建设厅内改设林业处,专管边区林业工作。次年6月,专设陕甘宁边区林业局。为使植树造林活动制度化,边区政府制定了许多条例、规则,如《陕甘宁边区森林保护条例》《陕甘宁边区植树造林条例》《陕甘宁边区砍伐树木暂行规则》等。1942年4月15日,陕甘宁

热打铁,不失时机地响应党的“组织起来”的号召,在秋收时首先建起了10户50多人参加的“莫如信农业生产互助组”。互助组集中使用劳力、畜力、农具等,及时完成了秋收、翻茬、起粪、拉土、换炕积肥等工作。

1952年春,在党的号召下,互助组转为“莫如信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莫如信和社干部及老农共同研究商讨,按照各种作物的生长特性和农事规律,统一整地、施肥、播种、除草、滴水、收割、复种、翻茬、积肥等,详细制定年度生产计划,并发动群众集资买回弹花机、轧花机,开展副业生产。当年获得农副业双丰收,创宁夏碧玉麦亩产最高纪录。年终分配时,劳动日值达1元2角,比当时其他地区群众的劳动日值高40%以上,使得家家有余粮、户户有钱花。莫如信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成为宁夏当时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一面旗帜。乡亲们从农业生产合作社所取得的成绩中看到了“组织起来”的优越性,纷纷要求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3年,合作社扩大到23户,1954年增至38户,1955年达到高潮,全乡共5个村,有4个村的农民(包括地富)全部加入了他的合作社,另有三个小社也并入了他的社。随着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壮大和生产上采用新技术,各种作物的产量年年上升。1955年,小麦亩产平均增至520斤,这在当时的平罗是绝无仅有的新纪录。为扩大生产,他还带领社员开垦河滩地近千亩,每年收获粮食近17万斤。

1956年,莫如信高级农业合作社转为“前进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莫如信被选为社长。为增加收入,他带领农民在副业生产上开拓了很多门路,到1956年,合作社配备有两部弹花机、一部轧花机的弹花作坊,有30峰骆驼、7辆小车、8辆大车组成的运输队,有6人作业的粉坊、养猪场,15人作业的砖厂,3人作业的翻砂组,3人作业的缝纫组,9人作业的木工组,3人作业的油坊,2人作业的红炉(铁器)组,2人作业的磨坊。还在县城开办了4人作业的磨坊。这在当时全省都是独一无二的创举,得到了县、省政府和西北军政委员会的极大重视。西北军政委员会特将莫如信组织互助合作社的经验编成《平罗县莫如信农业生产合作社情况和经验》一书,印发到西北各地以资借鉴。

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莫如信担任了平罗县前进人民公社副社长。为了种好大白菜,增加社员收入,他专程到永宁县王太堡学习塋种大白菜的经验,在前进农场和其他大队推广,获得了很高的经济效益,增加了农民收入。

1951年至1963年,莫如信多次被评为县、省(自治区)劳动模范。1952年,还被评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到北京参加了全国劳动模范大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在天安门观礼台参加国庆观礼。他还先后被选为县、省(自治区)农民代表会议代表、县、省(自治区)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和政协委员。1973年,莫如信因病逝世,享年75岁。

(据宁夏党史学习教育网)